

萨都刺入方国珍幕府说辨析

周明初 王禹舜*

〔摘要〕元末回族诗人萨都刺晚年入方国珍幕府,是钱谦益首先提出来的,得到后来许多学者的支持。但此说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方国珍最忌色目人,而萨都刺是色目人;(二)现存的萨都刺的创作中没有涉及方国珍及治下的人或事,也没有到过方国珍辖地的迹象;(三)现存的方国珍治下的文人创作中也没有涉及萨都刺有关的人或事;(四)最早的记载萨都刺与方国珍关系的两条史料本身存在着问题。因此,萨都刺入方国珍幕府说依据不足,可信度不高。

〔关键词〕萨都刺;方国珍;幕府;史料辨析

萨都刺是元末著名诗人,回回人。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他晚年的状况如何,至今仍存在许多谜团,萨都刺有没有入方国珍幕府就是其中的一个。

就目前所见的资料而言,萨都刺入方国珍幕府说的始创者应当是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其《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刘左司仁本”条说:

方氏盛时,招延士大夫,折节好文,与中吴争胜。文人遗老如林彬、萨都刺辈,咸往依焉。至正庚子,仁本治师会稽之余姚州,作雩咏亭于龙泉左麓,仿佛兰亭景物,集名士赵倬、谢理、朱右、天台僧白云以下四十二人,修禊赋诗,仁本自为之叙。^①

又同集“方参政行”条也说:

谷真窃据时,招延文士,萨天锡、朱右辈咸往依之。刘仁本、詹鼎则亲近用事。^②

文中的“谷真”即方国珍。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四“刘仁本”条、周昂《元季伏莽志》卷七《表忠传·刘仁本传》、戚学标《鹤泉文钞》卷上《论刘仁本》、陈衍《元诗纪事》“萨都刺条”等均采钱著“刘左司仁本”条,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四“方行”条、顾嗣立《元诗选》三集之“方参政行”条则采钱著“方参政行”条。可以说,清人有关萨都刺与方国珍关系的记载均来源于钱谦益。

至近人柯劭忞的《新元史》卷二二七《方国珍传》,则径言萨都刺入方国珍幕府:

先是,有周必达者,隐天台山。国珍造其居问之,必达曰:“当今四方大乱,君能举义除盗,名正言顺,富贵可致。余非我所知。”国珍不听。及屡败,始悔,曰:“不意黄毛野人,能料

*周明初,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310028;王禹舜,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310028。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4页。

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45页。

事如此。”由是国珍颇敬礼文士，萨都刺等皆入其幕府。^①
影响及于今，隋树森的《全元散曲》、章培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在介绍萨都刺生平时，均采萨都刺入方国珍幕府说。

然而萨都刺入方国珍幕府说，实在缺少坚实的史料依据，其说颇为可疑。今试作辨析。



萨都刺是回回人，属于元代的社会阶层中的第二等色目人，而割据浙东的方国珍最忌色目人。

元末明初瞿佑所作的《归田诗话》卷下“梧竹轩”条说：

丁鹤年，回回人。至正末，方氏据浙东，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避无常居。有句云：

“行踪不异臬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识者怜之。^②

又《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戴良传》附《丁鹤年传》也说：

时又有丁鹤年者，回回人。……避地四明。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

为童子师，或寄僧舍，卖浆自给。^③

而元末明初时萨都刺的友人戴良的《九灵山房集》卷一九《高士传》记丁鹤年在四明（即宁波）时的状况称：

鹤年转徙无常，大抵皆明之境内。明当方氏之盛，幕府颇待士，士之至者踵接。鹤年独

逡巡远避，门无一迹。^④

“逡巡”是有所顾忌而不敢向前的意思。丁鹤年“逡巡远避”的原因，除了生性高洁，不欲依附于人外，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顾忌自己的色目人身份，生怕遭遇不测，因而远避深忌色目人的执政者方国珍。

杨光辉的《萨都刺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引戴良文，认为“鹤年当年只是主动逃避，而并无受迫害之说。”^⑤他大概没有注意到“逡巡”是什么意思，也不去探究为何在“士之至者踵接”的情况下，丁鹤年“独逡巡远避”。

杨著又举方国珍之子（实际应当是侄）方行有诗《怀丁鹤年高士》及当时的色目诗人迺贤、金哈刺“都与方氏集团关系密切”，来证明方国珍最忌色目人之说靠不住、丁鹤年不大可能受到方国珍迫害，从而证明萨都刺入方国珍幕府是可能的，^⑥这同样是缺少说服力的。因为：

一、丁鹤年活至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十岁时才逝世，方行在元末曾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随方国珍入明，后来徙之濠上。故方行与丁鹤年的交往在入明后、徙濠上之前的可能性不是没有，正如宋濂曾经为方行的《东轩集》作序是在入明后一样。即使方行此诗是在方国珍割据浙东期间所作，也不排除“善诗”的方行因仰慕丁鹤年的诗名^⑦，而单方面向丁鹤年示好的可能。所以用一首没法确定作于何时、又是在何种情况下所作的诗作例子，并不能说明问题。

二、关于迺贤与方氏集团的关系，杨著并没有具体展开，只是加注说明来自陈高华先生的《元代诗人迺贤生平事迹考》。核查该文可知：迺贤，汉名马易之，葛逻禄人。因先世迁居庆元路治所在地鄞县（今浙江宁波），遂为鄞人。曾两次北游京师。第二次游历，自至正五年（1355）离开家乡，至

①柯劭忞：《新元史》，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8年，第879页。

②瞿佑：《归田诗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6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28页。

③《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13页。

④戴良：《九灵山房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67页。

⑤杨光辉：《萨都刺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页。

⑥杨光辉：《萨都刺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第30—31页。

⑦《明史》卷一二三《方国珍传》：“（国珍）子礼，官广洋卫指挥金事；关，虎贲卫千户所镇抚；关弟行，字明敏，善诗，承旨宋濂尝称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00页。）

正十三年(1353)返回。回来不久,即遇上方国珍浙东起事。方国珍在攻陷庆元后,于至正十八年(1358)开府于庆元。陈高华先生该文虽然也论述了迺贤与方氏集团中的幕僚刘仁本的交往,但主要意思还是在说迺贤因为方国珍深忌色目人而韬晦避祸。现引录有关原文如下:

关于迺贤回到庆元后的生活情况,据他的友人乌斯道说:“易之居城郭中,萧然一室不色忧,在位贵人恒造其门与谈笑,则言不谄而礼不倨。人有賂之以干贵人者,辄谢去。或贵人与之钱则受不辞,曰:‘賂不可黷,周之可受也。’接朋友宾客,惟论古今典故,未尝道及官府事,此皆易之通事理适时宜而得以从容于斯世也。”另一位友人朱右说:“[易之]平居安贫自守,有道淑人,虽屡空乏,不以动于中。国家多故以来,处一室,教子弟习礼读书其家。朋友有急,则挺然为解纷无德色。达官贵人咸信重之。”从二人所述可知:(一)居于城中,以授徒并接受“贵人”的馈赠为生。(二)生活困苦。(三)不言时事。按,迺贤平素“忧时气激烈,抚事歌慨慷”(见上引诗),至此为之一变。原因非他,“方氏据浙东,深忌色目人”。迺贤为保全自己,不得不深自韬晦,才“得以从容于斯世也”。(四)与当时的达官贵人有来往。其中可考者是刘仁本。仁本系元朝进士,入方国珍幕,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他与迺贤交往颇密,曾为《河朔访古记》作序,在生活上对迺贤颇多照顾。^①

杨著将该文用作迺贤等色目人与方氏集团关系密切,从而证明方国珍深忌色目人之说靠不住,可说是将陈高华先生的原意正好颠倒了。

三、关于金哈刺与方氏集团人物的关系。杨著引述了台湾学者萧启庆《元色目诗人金哈刺及其〈南游寓兴诗集〉》中的观点,现转引如下:

(金哈刺)长期活跃于方氏势力范围之台、温、庆元一带,与方氏之左右手刘仁本、张本仁、丘楠、郑永思等皆有唱酬关系。与方氏之左右手刘仁本交谊尤殷。^②

为何金哈刺长期活跃于方氏势力范围之台、温、庆元一带,为何他又与方氏之幕僚们进行唱和?杨著则没有加以说明。其实萧启庆的原文中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元朝的税粮主要依靠江浙等南方地区,由于方国珍、张士诚起兵反元后,从江浙向元大都输送粮食的海运中断,北方的粮食补给出现严重问题。在元廷招降方、张后,为恢复海运,朝廷派金哈刺任海道防御都元帅于台州,协调方、张合作海运。杨著所引的这段文字其实还有上下文,如果完整引述,有助于理解当时金哈刺与方氏集团的关系:

哈刺之出任海道防御都元帅大约与方国珍出任防御海道运粮万户之时间相近。都元帅一职系“配虎符印章,锡万户职,监漕运,镇海邦”,地位应与方氏所任运粮万户相当。两者之间有无上下统辖关系已难确证。由诗集可以看出,哈刺在东南期间,长期活跃于方氏势力范围之台、温、庆元一带,与方氏幕僚刘仁本、张本仁、丘楠、郑永思等皆有唱酬关系。与方氏之左右手刘仁本交谊尤殷。而仁本便是国珍主理海运业务者。哈刺担任海道防御都元帅之主要任务显然在于负责与方氏协助海运工作并加监督。其与方国珍之关系可能有如元朝一般机构中达鲁花赤(多由蒙古色目人担任)与正官(多由汉人担任)之间的关系。^③

金哈刺是元朝命官,方国珍在降元后名义上也是元朝命官,故金哈刺在方国珍割据的浙东地区活动可谓名正言顺,方国珍虽然深忌色目人,但也不能将他怎么样。他与方国珍的幕僚交好,进行唱酬活动,也是有这层关系在。方国珍的这些幕僚,都是文士,文士之间相互酬唱,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更何况,其中像刘仁本、丘楠这样的人,他们本来就是元朝的官员,之所以入方国珍幕府,是因为方国珍后来降

①陈高华:《元代诗人迺贤生平事迹考》,《文史》第三十二辑(杨著误作三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54页。

②杨光辉:《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第30页。

③萧启庆:《元色目文人金哈刺及其〈南游寓兴诗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58—759页。按:据杨著所引版本为《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9年,第312页。

元,奉元为正朔的缘故。他们在方国珍手下所任职务,其实也是元廷授予的。这里举与金哈刺关系最密切的刘仁本为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集部别集类二一刘仁本《羽庭集》六卷提要谓:

仁本,字德元(当作“玄”,以避讳改),天台人。以进士乙科,历官温州路总管、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时方国珍据有温、台,招延诸郡士大夫,仁本入其幕中,参预谋议。国珍岁治海舟,输江淮之粟于大都,仁本实司其事。其所署省郎官,盖即元所授,故集中诸作,大都咸慨阽危,眷怀王室。其从国珍,盖欲借其力以有为,徐图兴复,亦如罗隐之任吴越,实心不忘唐。……厥后国珍兵败,仁本就擒,抗节不挠,至鞭背溃烂而死。则仁本终始元人,未尝一日入明。^①

刘仁本这样的文人,本来就心向朝廷,只是迫于情势,不得不委身于方国珍幕府中,像这样的人,遇到代表朝廷的命官前来,怎么会不倾心结交?所以用金哈刺的例子来说明方国珍不忌色目人,并没有说服力。

综上,生活在浙东地区庆元一带的色目文士丁鹤年、迺贤等人,处于方国珍的割据统治下,因为顾忌自己的色目人身份,要么“逡巡远避”,要么“深自韬晦”。事实上,为方国珍所网罗的文士中,从现有的资料看,似乎并没有色目人。刘仁本入方国珍幕后,除为方国珍实际主持漕粮北运大都的工作外,还为方国珍治下兴儒学、修水利,负责招募人才。在至正二十年(1360)时他在余姚州龙泉山仿兰亭建雪咏亭,三月三日,邀浙东名士赵俶等四十二人,举办“续兰亭诗会”,作《续兰亭诗序》,刻成诗集。元末明初陶宗仪所编《游志续编》卷下所收《续兰亭诗序》一文,文后列有参与盛会的四十二人的姓名,并无一人是色目人。^②

萨都刺本来就并不生活在方国珍割据下的浙东地区,他却要前往“深忌色目人”的方国珍手下作幕府,按常理推测也是不大可能的。

二

从现存的萨都刺的诗文中看不出他到过浙东方国珍的辖地,也没有任何诗文中涉及方国珍和曾入他幕府中的人物。

萨都刺的集子,现在通行的版本是清嘉庆十二年(1809)其后裔萨龙光编刻的《雁门集》十四卷本。这是他花费了一二十年时间,将当时他所能得到的有关萨都刺的集子版本相互参校从而编定的版本,是目前收录萨都刺诗词最全的一个版本,不过其中也混杂了一些别人的作品,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殷孟伦、朱广祁的整理点校本。而国内现存的最早的两个版本是明成化二十年(1484)张习所刻的《雁门集》八卷本和明弘治十六年(1503)李举所刻的《萨天锡诗集》五卷本,前者藏国家图书馆,后者在民国年间已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入《四部丛刊》中。此外,保存在日本的和刻本《新芳萨天锡杂诗妙选稿全集》一卷《后跋文疏》一卷,所收的一百四十多首诗词中,有近一百首诗词是萨龙光所编刻的《雁门集》中没有收录的,属于萨都刺的佚诗,而《后跋文疏》中还有数篇佚文,当代学者如张旭光、葛兆光、李延年、杨镰、杨光辉等均进行过萨都刺的诗文辑佚工作。

萨都刺在登进士第后,先后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江南行御史台掾史、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知事、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等职,任职途中、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大量的涉及当地风物、与当地士人交游的诗歌。在他的《雁门集》里有许多写于两浙境内包括浙东

^①《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1452页。

^②陶宗仪编:《游志续编》,清嘉庆宛委别藏本,稿本。

的严州(今建德)、婺州(今金华)、衢州以及绍兴一带的诗歌,或与境内的景物有关,或与境内的人物有关,但看不出一首诗是涉及到方国珍治下的浙东庆元(今宁波)、台州、温州地区的人或物的,在现代学者所辑佚的诗文中也没有见到。如果他真的入过方国珍幕府,哪怕是并没有入过方国珍的幕府、仅仅是到过他治下的浙东庆、台、温三地区,也应当有涉及到这些地方的人或物的诗文。虽然现存的(包括现代学者所辑佚到的)萨都刺诗词文不是他的全部创作,他有不少作品应当已经亡佚了。但不管怎样,如果萨都刺真的到过方国珍辖地并且创作有诗词文的话,不可能所写的这些涉及方国珍治下的浙东地区的人或物的作品恰好全部亡佚。

目前所见的萨都刺作品中涉及浙东庆、台、温地区的人或事的,只有《送丁太初赴永嘉学正十八韵》一首诗歌,这首诗并不是作于方国珍割据浙东时期,而且作者是否萨都刺也是个问题。此诗原见于弘治年间李举所刻《萨天锡诗集》之《五言长律》,萨龙光编刻的《雁门集》中系年于卷四“文宗至顺三年壬申”条下,表明是萨都刺在翰林国史院任职期间所作;此诗又见吴当《学言稿》卷二,题作《送丁太初温州蒙古字学正》。两书所收此诗,略有异文,如首两句,《雁门集》作“国学崇儒代,人材绝妙年”,《学言稿》则作“国字崇当代,人才起妙年”。按:蒙元时期以蒙古语为国语,在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作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称为“蒙古国字”,凡皇帝的诏旨及国家颁布的文告、法令、印章、牌符、钞币均用蒙古国字,并在全国诸路设立蒙古字学,专门教授蒙古新字。据《学言稿》中的诗题,可知丁太初正是专门教授蒙古字的学官,诗中“国字崇当代”,正是当时蒙古国字通行全国并受到尊崇的真实写照,也正与诗题中“蒙古字”相切合;而《萨天锡诗集》及《雁门集》中作“国学崇儒代”竟不知所云,且“儒代”一词为生造词,当是后人不识“国字”为何物,以为是“国学”之误,又妄改“当代”为“儒代”,造成不通,以致失去原诗面貌。两相对照,吴当为此诗原作者的可能性更大。又现今的《雁门集》中,诗歌的真伪情况非常复杂,与他人重出的诗作很多,有些显系误收他人之作,据杨光辉的考证,《雁门集》中光误收黄潜的诗歌就达18首之多^①。杨著将《送丁太初赴永嘉学正十八韵》当作真伪难辨的诗作,笔者则认为此诗应当是吴当诗误入萨都刺集中,并且经过了后人的妄改,以致首句文义不通。

三

从入方国珍幕府的浙东文人的创作中,也看不出他们有与萨都刺交游的经历。

在方国珍割据浙东时,入于他的幕府为他效力的人文人有刘仁本、张本仁、郑永思、詹鼎、丘楠等。除刘仁本外,其他几位很少有作品流传下来。刘仁本于至正二十年(1360)在余姚龙泉山仿兰亭建雩咏亭,三月三日,邀浙东名士赵俶等四十二人,举办“续兰亭会”,作《续兰亭诗序》,刻成诗集。从收入陶宗仪所编《游志续编》卷下的刘仁本《续兰亭诗序》一文的后所列参与盛会的四十二人的姓名来看,钱谦益两条有关萨都刺的史料中提及的赵俶、谢理、朱右等人俱列名其中,但不见有萨都刺之名。

又刘仁本有《羽庭集》六卷存于世,系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收入《四库全书》中。在《羽庭集》中,收有他与朱右、赵俶、谢理等人交游的诗文,如与朱右(字伯贤,也作伯言)的交游,卷一有《为朱伯言题卷》、卷三有《宿止虞凤山长庆寺简朱伯贤》等;与赵俶、谢理的交游,卷三有《送赵彦林谢玉成奉表进呈》、卷五有《送谢玉成事进表序》。赵俶,一般的传记资料中仅记他“字本初”,称他于洪武初年征为国子监博士,查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六一《国初国子监司业行实》

^①杨光辉:《萨都刺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第109—112页。

有：“赵俶，字□□，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洪武初荐举，四年任。”^①可知他在洪武四年任国子监司业，又元末明初张以宁《翠屏集》卷三《张氏父子善行序》中称“以今闻于国子司业赵彦林言”^②，可知彦林正是赵俶的字或号；谢理字号久佚，《元诗选》在谢理的小传中字号即作空缺，《羽庭集》卷五文题称“谢玉成都事”，而谢理在元朝时任“江浙行枢密院都事”，且“理”的本义即为“治玉”，故玉成当是谢理之字。

而从此诗集中，却看不出他与萨都刺有任何交集。按理说，作为方国珍最重要的幕僚，刘仁本为方国珍主持文教工作，为他引荐招募了不少人才，如果萨都刺真的入方国珍幕府的话，应当与刘仁本有所交往的，不至于两人之间没有诗文往还。虽然，刘仁本的《羽庭集》六卷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并非完帙，如上文所提及的《续兰亭诗序》，即没有收入此集中。但总不至于萨都刺与刘仁本两人所交往的诗歌恰好都亡佚了，都没有被收入现存的各自的集子中吧，如果两人真的有所交往的话。

四

钱谦益关于萨都刺“往依”方国珍的史料存在较大的问题，不足为凭。

一、关于萨都刺。先看上文已引“刘左司仁本”条中的文字。文中谓方国珍盛时，为与张士诚争胜，折节文士，林彬、萨都刺等文人遗老“往依”之，此文字接在至正庚子刘仁本在余姚龙泉左麓仿兰亭集会作修禊赋诗事之前。显然，钱谦益认为林彬、萨都刺“往依”方国珍是在至正二十年庚子（1360）之前。既然如此，刘仁本在至正二十年三月三日于余姚龙泉左麓修禊赋诗时，所列名的四十二人中为何并没有此两人呢？

其实至正二十年前后，萨都刺正任职江南行御史台宣使，不可能“往依”方国珍。杜春生所辑清道光年间所刻的《越中金石记》卷十收有朱簪《御史大夫康里公勉励学校记》碑，据碑文所署，此碑的立石时间为至正二十一年正月，此碑记康里公于至正十八年（1358）冬任江南行御史台后，在绍兴路兴学校育人才之事，记事至至正二十年（1360）正月后，碑中“并纪一时僚佐名氏于左”，在所列名的行御史台僚佐“宣使”栏中共22人，位列第十一名即是萨都刺。这说明在至正十八年至二十年期间，萨都刺正任江南行御史台宣使。杨光辉结合萨都刺《登两山亭》诗，考证出萨都刺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宣使是在至正十九年（1359）春天后。^③

按康里公即庆童，《元史》卷一四二有传。据该传：

（至正）十八年，迁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未行，拜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赐以御衣、上尊。时南行台治绍兴，所辖诸道皆阻绝不通。绍兴之东，明、台诸郡则制于方国珍；其西杭、苏诸郡则据于张士诚。宪台纲纪不复可振，徒存空名而已。二十年，召还朝。庆童乃由海道趋京师。拜中书平章政事。^④

这与《御史大夫康里公勉励学校记》正可以互相参证。江南行台治所原在集庆（今南京），于至正十六年移至绍兴，故萨都刺在至正十八年至二十年任南行台宣使正是在绍兴。核之《雁门集》，除《吴越两山亭》（亭在萧山东北四十里）、《蜀山草堂》（草堂在山阴蜀山）、《江声草堂》（草堂在萧山西兴镇）、《航坞山》（山在萧山东四十里）、《东山》（山在上虞西南四十五里）、《洛思山》（山在萧山东北三十六里）、《石夫人诗》（萧山凤凰山石崖门有望夫石，阴雨时望之如妇人）这些写于绍兴路辖下山阴、萧山、

①雷礼：《国朝列卿记》，《续修四库全书》第5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11页。

②张以宁：《翠屏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7页。按：原文“司业”误作“司乐”。

③杨光辉：《萨都刺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第22—26页。

④《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99页。

上虞县的诗歌应当都是创作于这一时期。萨都刺的裔孙萨龙光编校的《雁门集》将这些诗歌系年于至正十三年(1353),谓萨都刺避地过杭州赴绍兴,是缺乏依据的。

大约在庆童离任之前后,萨都刺也离开了绍兴,来到杭州寓居。《雁门集》中《秋日寓钱塘》、《九日遇雨》(写重阳节遇雨)可能就是他离开绍兴寓居杭州时期所作。关于他寓居杭州期间的情况,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五四《寓贤》“萨都刺天锡”条说:

萨都刺天锡,雁门人,寓居武林。博雅工诗文,风流俊逸,而性好游。每风日晴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借,遍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以题品之。今两山多有遗墨,而《西湖十景词》尤脍炙人口。竟莫知其所终。^①

他的晚年应当终老于杭州,虽然具体的卒年已经不可考了。

所引钱谦益有关方国珍事迹的两条史料中所提及的赵俶、谢理、朱右等人,从刘仁本的《羽庭集》中的交游诗作及《续兰亭诗序》所列的四十二人名中均可查到,他们“往依”方国珍,可谓于史有征。但“刘左司仁本”条中所提到的林彬、萨都刺二人“往依”方国珍,从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任何早于钱谦益的史料可以得到查证。

二、关于林彬。查找各种史料,元明之际活动于浙东一带的,并无“林彬”其人。倒是有一个“林彬祖”,是元末人,与方国珍有交集。

林彬祖,字彦文,元处州路丽水县(今属浙江)人,至正五年(1345)乙酉科进士,曾任永嘉县丞,后任青田县尹。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的军队进攻处州,处州守将石抹宜孙拒明军,林彬祖任石抹宜孙参谋。此事《明史》卷一三三《胡深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皇明大政纪》卷一等均有载。而雷礼辑《皇明大政纪》所载尤详,谓兵败后林彬祖走温州,其书“(己亥)十一月壬寅克处州”条说:

上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驻兵缙云之黄龙山,谋取处州。元处州守将石抹宜孙遣元帅叶琛屯桃花岭,参谋林彬祖屯葛渡,镇抚陈仲真、照磨陈安屯樊岭,元帅胡深守龙泉,以拒我师。……石抹宜孙战败弃城,与叶琛、章溢走建宁,遂克处州。林彬祖走温州,于是处州七邑皆下。^②

当时的温州正处于方国珍的割据势力下,而名义上还属于元朝的管辖之内,由元朝任命的江浙行省都镇抚、方国珍之侄方明善分驻。林彬祖奔温州后,被元朝任命为江浙行省枢密院都事,后改任福建行省检校官。至正二十五年(1365),时任江浙行省右丞的方明善重修温州路谯楼,林彬祖为之作《重修温州路谯楼记》,署名即为“从仕郎福建行中书省检校官”,此碑记《(光绪)永嘉县志》卷二二《古迹二》有载,后收入《全元文》第五十六册中。

林彬祖是当时的江南名士,与迺贤等人齐名。吕不用《得月稿》卷七《先伯父晚翁行实》谓:

凡士大夫,若越之夏泰亨叔通、鄞之马迺贤易之、温之林温似温、处之林彬祖彦文、上饶

徐容仲容、吴兴宇文子贞公亮诸公,号称江左名士,莫不与之论金石契。^③

林彬祖是元朝进士,又是“江左名士”,在处州失守后逃至方国珍割据下的温州,正符合钱谦益在“刘左司仁本”条中所说的“文人遗老”“往依”方国珍的情状,因此钱谦益所说的“林彬”很可能是“林彬祖”之误。

综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两条涉及萨都刺的史料,或于史无征,或将人名搞错,已经难以考知这两条记载的原始史料来源是什么。因为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并不足为凭。

①徐象梅:《两浙名贤录》,《续修四库全书》第5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②雷礼:《皇明大政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70页。

③吕不用:《得月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63页。

五

由上可见,萨都刺入方国珍幕府说由于存在着这样四方面的问题:(一)方国珍最忌色目人,而萨都刺是色目人;(二)现存的萨都刺的创作中没有涉及方国珍及治下的人或事,也没有到过方国珍辖地的迹象;(三)现存的方国珍治下的文人创作中也没有涉及萨都刺有关的人或事;(四)最早的记载萨都刺与方国珍关系的两条史料本身存在着问题。因此,萨都刺入方国珍幕府说依据不足,可信度不高。

(责任编辑:邓晓东)

A Fact Checking of Sa'dal-Allah's Service as an Aid in Fang Guozhen's Office

ZHOU Ming-chu, WANG Yu-shun

Abstract: Qian Qianyi was the first scholar proposing that Sa'dal-Allah, an Islamic poet of the Late Yuan Dynasty, once worked in his late years as an aid in Fang Guozhen's office. His opinion was supported by some other scholars. However, the following four facts are at odds with Qian's proposal. Firstly, Fang Guozhen was openly hostile to people of minority groups, and Sa'dal-Allah was a poet of Hui nationality. Secondly, in Sa'dal-Allah's extant works, there is no record of the people and events concerning Fang Guozhen as well as his travel to the region under Fang's governance. Thirdly, scholars sponsored by Fang Guozhen left no record of Sa'dal-Allah in their writings either. Finally, the earliest two historical records indic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ng Guozhen and Sa'dal-Allah are questionable. Therefore, it is doubtful that Sa'dal-Allah once served as an aid in Fang Guozhen's office.

Key words: Sa'dal-Allah; Fang Guozhen; office of the commanding officer; analysis of historical records